

中国民族学

CHINA ETHNOLOGY



第九辑

目 录

- 范式的建立：试论我国跨民族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
- 他山之石——LSE人类学的传统与发展
- 《圣经》和《古兰经》中的“至上神”概念及其译名辨析
- 蒙古社会的活佛转世系统
- 中国清真寺建筑文化的人类学解析
- 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与蒙汉关系——以地租、地契、地权为中心的探讨
-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问题论析
- 古代华南边域的历史变迁
- 肃南双海子裕固族移民过程的心理人类学考察
- 近十年西北干旱区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 藏传佛教高僧在和谐藏区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以藏区社会控制视角为切入
- 多拉仁姆山的人与神：祁连山西北缘东纳部落的山神信仰及其变迁
- 关于对口支援新疆建设的几点认识
- 民族地区和谐新农村建设初探——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
- 土家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基于百福司镇的调查分析
- 中国县域文化与居民人格的田野工作主位研究
- 藏族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汉“双语”教学的调查与思考

范式的建立:试论我国跨国民族 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

武沐 张峰峰^①

引言

1995年,马曼丽教授正式提出了“跨国民族”的概念^②,实际上,这也标志着跨国民族研究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虽然学界在概念的使用上一度存在着争论,出现了“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这样的概念,但我们应该看到马曼丽教授不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更是着手创立了一套理论体系。自此之后的十多年中,学界逐步接受并发展了跨国民族研究,相关研究渐呈蔚然之势。

如此的景象也正迎合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paradigm),科学革命的过程即以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虽然反对将此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但范式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张力作用却是其始料未及的^③。在这里,笔者结合我国近十多年来的跨国民族研究成果,讨论这一范式的建立过程。

马曼丽教授在《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一书的开篇设有“跨国民族研究综述”一章,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开始讨论,对各种研究成果包括各种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④;周建新、黄超曾以1840年为起始点,就中国百年来的跨国民族研究进行了总结^⑤,并将跨国民族研究进行了历史分期,即分为“资料积累期”、“萌动期”、“起步和发展期”这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中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对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另有学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跨界民族”研究进行了整理,跨界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也多次召开学术会议进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

近年来,相关成果日益增多,可见跨国民族研究在学界的影响力,在总结这些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跨国民族作为一种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这也将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围绕相关概念展开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该是跨国民族研究正式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既有核心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又有学界围绕相关概念展开的讨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期。马曼丽教授在提出“跨国民族

①武沐,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峰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0级硕士研究生。

②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第32~4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③崔伟奇,史阿娜:《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学习与探索,2011(1)。

④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第13~2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⑤周建新,黄超:《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族”这一概念的时候,认为该概念与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在性质上并没有重大原则区别,但“取一种能尽量含盖该范畴的各种现象的、较明确的术语,是必要的,可以补足‘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未能含盖跨越数国、或漂洋过海、或不毗邻的跨国民族之缺陷”^①。罗树杰先生则认为:“不管‘跨界民族’,还是‘跨境民族’都比较模糊,不够明确,而采用跨国民族则非常准确、直接明了”^②。

此后,直至世纪之交,仍有学者力图从多角度来就相关概念进行区分,朱伦先生从东西方学界翻译上存在差异的角度对“跨界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了质疑,提出运用“跨界人民”^③。杨勉先生认为“跨界民族”改为“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并撰以专文与朱伦先生进行商榷^④。周建新先生也坚持使用“跨国民族”,因为“国”体现着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归属^⑤。曹兴先生认为:“跨界民族是被动(被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割的结果,跨境民族是主动临时性的‘移民’或长期移民的产物。”同时,他也认为跨界民族问题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⑥,如此的观点也招致了其他学者的批判。另外,丁延松、石茂明等人都曾专门进行过相关概念的辨析和总结。

马曼丽教授在提出“跨国民族”这一概念之后,又发展性地提出了“跨国族体”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人口跨国流动和迁移这一大环境而产生的,“跨国族体”这一群体脱胎于“跨国民族”但在外延上又超越于“跨国民族”,理应引起学界的重视。近几年,马曼丽教授又根据跨国民族迅速发展扩大的趋势,将“跨国民族问题”改为“跨国族体问题”^⑦,并结合非传统安全方面的理论探讨相关问题的产生和治理措施^{⑧⑨}。

及至今日,我们发现学界在使用相关概念时仍然不统一,事实上,各种概念的使用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正确与否,其运用可能要受到具体语境的限制,但“跨国民族”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已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机械性地区分与辨析相关概念当非明智之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的频繁跨国流动已经超越了过往的时代,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在逐渐发生着变迁,发展性地看待与运用相关概念也是时代之所需。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跨国民族”并非简简单单的一个名词,其复杂性就在于其蕴藏的学术内涵。马曼丽教授认为:“跨国民族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无论是相邻两侧的、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这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需要有相同的渊源关系,跨国民族迁居他国后基本保留着原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共同特征和民族认同;同时,无论跨居几国,仍是同源同族,应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和民族经济基础、一定的用于开展活动的中心地,并以民族认同感的消失作为跨国民族消亡的标志。这也就对跨国民族进行了一定的界定,跨国民族不同于分散的

①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第3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②罗树杰:《还是使用“跨国民族”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③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1)。

④杨勉:《“跨界民族”改为“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与朱伦先生商榷》,世界民族,2000(4)。

⑤周建新:《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⑥曹兴:《论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⑦马曼丽,马磊:《论跨国族体问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与对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⑧马曼丽:《论当代跨国族体问题中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⑨艾买提,马曼丽:《论世界跨国族体问题的时代性及其非传统安全治理》,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侨民和群体性的移民,它更加注重文化认同上的同源性。

跨国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这也深化了人们对“民族”基本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周建新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族缘政治”这一概念,认为跨国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形式,乃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①,这也可以解释一些传统的地缘政治所难以包纳的问题。邹吉忠先生对从边疆到边界、从国界到边域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了考查,分析了跨国民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并将跨越国界共同生活、共享自然资源与历史记忆的人们的关联性生活区域称为边域,这样就认识到了跨国民族的特殊活动范围^②。汪金国、王志远分析了在西方学界日益频繁出现的“diaspora”一词的中文翻译方法,主张将其汉译为“散居族裔”,相较于“跨国民族”、“跨界民族”,它们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重合性,但是不具有完全的共时性,散居族裔、跨国主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需要引起学界的注意^③。

跨国民族概念的提出为学界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鸣,在争鸣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直到今日,这一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它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对于民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启示,围绕着概念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堪为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基础。

二、对世界和我国跨国民族的具体研究

(一) 世界民族问题中的跨国民族问题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多位学者具体分析了国外的跨国民族问题,在讨论欧洲的跨国民族现象时,如葛宁、安俭就分别结合科索沃问题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了其中的跨国民族问题^{④⑤},胡健在探讨希腊与马其顿两国冲突时^⑥、周建新在考察爱尔兰民族问题时,也分别运用了跨国民族的分析视角^⑦,李红杰对位于德国和丹麦两国交界的石勒苏益格地区的“德籍丹麦人”与两国的交往历史进行了总结,历史上该地区曾经是民族问题的敏感地带,二战之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则逐渐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趋于和谐,遂将之视为处理跨界民族关系的“典范”^⑧。

在南亚问题上,曹兴、刘艺均对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泰米尔人问题进行了分析,注意到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冲突的由来、猛虎组织的产生等都与泰米尔人跨境民族问题具有重要关联^{⑨⑩}。

在东南亚问题的分析上,范宏贵先生在《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中对我国西南地区跨国民族做了一定的考察,指出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的一些民族存在着同源关系。韦红在《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对东南亚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五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

①周建新:《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②邹吉忠:《边疆·边界·边域——关于跨国民族研究的视角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③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世界民族,2011(2)。

④葛宁:《阿尔巴尼亚及其跨国民族》,世界知识,1999(9)。

⑤安俭:《从科索沃危机论世界跨国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⑥胡健:《论希腊与马其顿两国冲突(1991-1995)》,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⑦周建新,覃美娟:《边界、跨国民族与爱尔兰现象》,思想战线,2009(5)。

⑧李红杰:《欧洲跨界民族的典范——记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人与德意志人》,世界民族,2002(6)。

⑨曹兴:《僧泰冲突与“猛虎”组织》,世界民族,2002(6)。

⑩刘艺:《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看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问题》,南亚研究,2007(2)。

结,可以由此看出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与跨国民族问题存在重要关联。黄兴球先生对老挝、泰国两国之间存在的11个跨国民族的跨国历史进行了叙述,对其跨国特点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跨国民族作为一种民族现象,这一概念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具有普适性的,学者们所分析的诸多世界民族问题都可运用相关的思考角度来加以认识,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就是魁北克两个跨国民族在语言的使用及其他权利争取方面的问题演变而来,而巴以冲突则与美国的干涉有关,这与犹太人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密切联系,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均与跨国民族问题有着重要关联,跨国民族理论的提出也就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中亚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的跨国民族研究

历史上中亚地区与我国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近代以来国界线的划定,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之间也就产生了诸多的跨国民族,自“跨国民族”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些跨国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研究。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建立了多个新的政权和国家,马曼丽教授就是因有感于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而提出跨国民族相关理论的,作为理论创新的兴起之地,马曼丽教授也充分挖掘了该地区的“学术资源”。在先后出版的多部相关的著作中,从多个方面对中亚与我国西北之间的跨国民族如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多克族、俄罗斯族等族的跨国历史进行了分析,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我国西北跨国民族问题之间的联系加以了探讨,中亚国家处理跨国民族问题上的得失也可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提供借鉴。

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之下,其他学者也就我国与中亚的跨国民族对西部边疆安全与稳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的分析,认为跨国民族的跨国交往及其产生的民族意识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哈萨克族的人口外迁问题、中哈两国哈萨克人民间交流等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做出了实证性的研究。在特定的跨国民族研究方面,学者们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东干人等跨国民族的研究方面都已刊布了诸多相关的论著,这些研究多从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理论运用上,学者们也尝试着结合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对西北地区的跨国民族问题进行了解析,这也无疑增加了讨论的深度。

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底蕴深厚,民族和文化多元,这就为建构跨国民族理论、讨论跨国民族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诸多学者在近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为深化认识和理解跨国民族理论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现实中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三) 西南地区的跨国民族研究

西南地区是我国另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西南地区各民族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缅甸、泰国等国的多个民族存在着天然的同生共源关系,故该地区的跨国民族也较为多元复杂,这也为讨论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场域。

在近十多年的研究中,西南地区的学者如范宏贵、方铁、张公瑾、何正廷、周建新先生等对西南地区跨居中越、中缅、中老等国跨国民族的分布、来源、人口、文化等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将各跨国民族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介绍,使学界基本掌握了这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更能看出西南地区各民族与越南、缅甸等国存在着族缘、亲缘关系。

另外,在苗族、瑶族、彝族、阿昌族等中国南方跨国民族的研究方面,亦有专门性的论著,石茂明先生即专门对跨国苗族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相关著作。由云南地区迁居泰国的回族穆斯林、跨居滇缅的

华侨、华人“果敢族”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对其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一定的考察。

需要注意的是,西南地区的跨国民族研究多立足于实际的田野调查,这也是该地区跨国民族研究的重要特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学者们通过田野点的建立和走访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的田野材料,这就为分析具体的跨国民族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对京族人哈庆节的研究上、在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研究上都明显体现出了这样的研究特点,值得关注的是,西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问题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多篇学术和学位论文均以此作为研究的主题,从多个层面上分析了跨国婚姻的产生、现状和影响。跨国婚姻的产生与邹吉忠先生所言的“边域”的现实存在有着重要关联,对相关问题的治理可能需要结合更多地方性的民俗民规。

无论是西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它们都为跨国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田野点”,跨国民族理论提出之后,诸多的学者皆以此为思考视角、对这两个地区的跨国民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既可体现理论架构的指导性作用,又可促进相关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获得发展。

(四) 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

早在“跨国民族”概念提出之前,金春子、王建民先生就已经出版了专著《中国跨界民族》一书,这也是国内较早对相关民族进行综合性研究与介绍的一部著作,在该书中,作者除了对西北、西南各跨界民族进行系统介绍之外,还就西藏地区的跨界民族如藏族、夏尔巴人、门巴(主巴)族进行了介绍,对其历史、人口、宗教习俗等加以了描绘^①。切排、桑代吉还以专文就夏尔巴人的族源和迁徙历史进行了考察,对其社会等级、语言、习俗等进行了分析^②。

在东北地区的跨国民族研究方面,金春子、王建民先生对东北、内蒙古跨界民族如朝鲜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跨居中俄、中蒙的跨界民族进行了简介,对各族的族源、历史、经济生活、宗教、习俗等方面予以了描述。近年来,我国内蒙古地区的跨国民族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对俄罗斯族、蒙古族在其中的作用都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这也是跨国民族研究的新的关注点。

(五) 对跨国民族所具有的现实性意义的探讨

跨国民族的研究开展之后,诸多学者即已认识到其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并对相关内容做出了定性的分析,曹兴先生曾对跨界民族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跨界民族问题的起因和诱发的政治问题^③。郝时远先生也曾指出:“包括跨国民族研究在内的涉及中国历史、周边关系、疆域领土、地域战略、地区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④其他多位学者也对跨国民族与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的和平、安全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讨论,认识到了相关问题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总的来说,跨国民族理论为我国的边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由于我国陆地国界线长达两万多公里,就陆疆安全与发展而言,跨国民族的研究视角可以适用于多个地区,时至今日,国内学者仍然在不断发掘相关理论的普适性价值,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跨国民族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提出以后,国内诸多学者皆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在此期间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也为充实跨国民族理论体系进行了铺

①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②切排,桑代吉:《夏尔巴人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06(1)。

③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6)。

④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序言第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垫。

三、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构成

(一) 概念以外的其他相关问题

上文所论的核心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成为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而另外的部分则是在此概念之下所具体论及的问题,其中涉及跨国民族的起源、分类和特征等基本问题,这也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在起源上,多将其归因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界线的划定,民族的迁徙也是跨国民族形成的重要原因。跨国民族一方面保持了固有的民族自我意识、共同特征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属性上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认同上的复杂性,雷勇先生分析了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指出了各种认同的特点及其带来的问题^①。杨文炯先生则从东干人的族称来进行考察,认为“东干”只是外族附加于该族群的,但可发现该族群在生活习俗上仍然保持着陕甘回族的一些特点,由其跨国的族群认同即可将之视为跨国民族^②。谷禾、谭庆莉分别讨论了历史、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认识到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向心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③。西南边疆地区的跨国婚姻也导致了跨国婚姻中入嫁中国一方的妇女及其子女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危机,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化过程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在跨国民族的分类上,胡起望先生在其文章中通过图例的方式加以形象说明,根据所跨居的地域和距离将跨境民族分为四种类型^④。黄惠焜先生从民族历史流动性角度将跨境民族分为“回归型”、“迁徙型”、“流动型”三种^⑤。周建新先生则认为可从多个角度对跨国民族这一复杂的客观存在进行分类,包括形成原因、存在形式、聚居状况等角度。^⑥马曼丽教授也曾对跨国民族问题的形式加以了阐释,并从跨国民族问题形成的不同历史背景将其分类为三种类型,即“一类是处于独立运动中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不合理疆域划分而要求合并跨国同族的领土、建立民族国家的争战。”、“另一类是原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中的跨国民族地缘冲突和离心倾向的动乱。”、“第三类是欧美实行西方政治体制的现代国家中也出现了以跨国民族分立主义为特征的动乱。”^⑦从多样的分类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跨国民族的产生和存在形式具有较为复杂的状况,这也可促使我们加深对跨国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形态的认识。

(二) “和平跨居论”的建立和发展

跨国民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形态因为跨居多国,可能会因此滋生出各类的问题,一些跨国民族甚至存在着领土和主权上的冀求,这必将不利于国家和地区的和平。鉴于此,马曼丽教授最早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处理族际关系的原则,提出了“和平跨居论”,这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跨国民族的积极因素为双边

①雷勇:《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5)。

②杨文炯:《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4)。

③谷禾,谭庆莉:《学校教育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云南社会科学,2008(1)。

④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⑤黄惠焜:《跨境民族研究论——〈云南跨境民族研究〉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⑥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第278~28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⑦马曼丽,冯瑞:《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民心的支持、所跨居国家双边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形式,跨国民族既有可资利用和发展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唯有趋利避害,跨国民族才能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故而,“和平跨居论”的提出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性意义,这也是促进跨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创举。随之,马曼丽教授也多次发展了和平跨居的理论,强调了主流文化底蕴以及跨国民族同源文化在和平跨居中的纽带作用,这也可为中国和平跨居模式的建立提供借鉴。同时,结合西北跨国民族的跨居特点,她也提出建立跨越国家的民间主导型和平跨居模式,由此模式构建地缘综合安全保障结构、发展好国际关系和多元文化^①。

就西北地区的跨国民族而言,哈萨克族堪为和平跨居之典型案例,艾买提就分析了阿克塞哈萨克族以“塞上侨乡”的身份与境外哈萨克族自由、和平往来的特点^②。任屹立、郭宁则以新疆伊犁哈萨克族与境外哈萨克族交流往来的过程为例,提倡将国家引导和民间互动相结合,构建积极互动的和平跨居模式,同时要警惕“三个主义”和“大哈萨克主义”的影响^③。

在西南地区跨国民族的研究方面,周建新先生对南方民族和平跨居模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先是从中老、中越跨国民族的角度来讨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提出了三个衡量指标,即国家的有效控制、为民族内部联合而不分裂国家、各相关民族互助共生互补自制^④。又从西南地区若干同源跨国民族文化上混合、具有共生共母性的角度提出了和平跨居的文化模式^⑤。再者,他在专著《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一书中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对南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进行了总结。

“和平跨居论”的提出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势,它为处理跨国民族问题乃至边疆安全问题都提供了新思路,该理论一经提出,学界即多有所发展和创新,这也是对理论建树加以完善的需要。

(三) 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总结

在上文中,笔者分析了近十多年跨国民族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和进展情况,跨国民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形成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在不断实践与发展之中得到逐步完善。

跨国民族理论体系是在“跨国民族”这一核心概念下所形成的一个整体,无论是各个地区具体的跨国民族研究,还是“和平跨居”、跨国民族认同等概念在研究中的具体使用,以及多位学者对于跨国婚姻等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等,这些都为补充和完善该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

从具体研究的角度上说,跨国民族研究中所涉及的多元的方法和学科亦为该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在方法的使用上,文献材料的使用、田野调查的运用、实证性的分析等皆可视作相关研究的方法体系。黄惠焜先生在探讨跨境民族研究方法时,早已指出,“它擅长描述但不局限于描述”、“它运用文献但

①马曼丽,艾买提:《关于边疆跨国民族地缘冲突的动因与和平跨居条件的思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2)。

②艾买提:《哈萨克阿克塞分支社会变迁与和平跨居的特点及启迪》,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③任屹立,郭宁:《中哈两国哈萨克族“和平跨居”模式探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3)。

④周建新:《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⑤周建新:《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8)。

不局限于文献,田野仍然是它的生命之源”^①,如是总结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再从所涉及学科上来说,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已经渗透到跨国民族的研究中,跨国民族也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性问题,跨国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形式,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多学科知识的渗透更能扩展跨国民族的研究广度。马曼丽教授也曾指出,跨国民族研究“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日益凸显,研究的视角明显趋向多元,呈现出从‘边政’向‘国际政治(或者说国家间政治)’和‘人类发展与民族过程’延伸、扩展的趋向”^②,这也就对跨国民族研究的独立性进行了展望。

金炳镐先生等学者曾以专文探讨跨界民族研究与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民族理论学科研究范畴的考察,认为跨界民族问题当然属于民族问题的范畴,加强相关研究当为民族理论学科的应有之义。同时,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跨界民族理论体系的内容归纳为由跨界民族概念问题、跨界民族特殊性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教训、我国处理相关问题的政策和原则等内容构成^③。金炳镐先生所阐述的跨界民族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性质上的归属,笔者在此处所讨论的跨国民族理论体系与之并不相违背,它也将跨国民族视为广义上的跨界民族,不同的是,笔者是从我国跨国民族研究的过程中归纳出来这一体系的,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释了民族之间关系的实质及其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揭示了民族发展的规律和基本条件,指明了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④跨国民族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就是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发现和观察到的一种客观存在,学者们在十多年的具体研究中也发展和完善了相关的理论,唯物地、辩证地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套理论体系还将对于分析跨国移民问题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四)对跨国民族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一点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是对真理性的评价却是二者所共通的,在美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真理性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即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同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真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存在着并不断发展变化的。^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协作,跨国民族理论体系是一个以核心概念为中心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是国内学者集体探索的结果,理论上的创新应该兼具完备性和预见性,这一理论体系也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而且还处于发展之中。

用信息理论来加以分析,社会科学知识创新是一个充分占有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并对其加以整理、研究和利用的过程,这就需要进行知识的整合并加以创造性的利用,在收集和管理社会科学研究资源

①黄惠规:《跨境民族研究——〈云南跨境民族研究〉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②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第2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③金炳镐,张兴堂,王芸芳:《加强跨界民族研究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1)。

④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裴长洪:《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第371~3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的前提下,在对知识进行激活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①。“跨国民族”并非一个简单的名词,要进行相关的研究也需要结合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开展,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知识整合和再发现的过程,其中融合了多个学科和多重方法。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更要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这也就需要坚持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政策,积极扶持本土社会科学,切实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第三世界加强本土社会科学研究,将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创新^②。人们在大力提倡文化多元、生态多元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上倡导本土化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将会增加研究成果的独创性和多元性,这也是世界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为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表现,其建立和发展过程都曾立足于我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增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四、小结

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是针对“科学革命”提出来的,但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也存在着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理论解释模式”^③。跨国民族理论的提出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轰动,诸多学者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之中,逐步推动着跨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就在学界形成了一种范式,吸引着更多学者在此理论体系之下进行具体探讨。它作为国内学界的集体成果,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为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研究和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同时它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处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尚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①杨丹:《社会科学知识创新方法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8(3)。

②王兴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国外社会科学,1991(6)。

③崔伟青,史阿娜:《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学习与探索,2011(1)。

他山之石^①

——LSE人类学的传统与发展

樊莹 杨文炯^②

人类学,仅就其学科史与跨学科的比较视角来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滥觞于西方国家却主要以非西方社会与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书斋的扶手椅上起步(19世纪60年代),到初民社会的特罗布里恩岛的“田野”(20世纪20年代),又跨越到王朝—国家—复杂文明社会中的江村经济(20世纪30年代),再回归欧美工业社会的本土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在又邂逅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球村”。这个学科史的动态过程不仅是学科“田野”转换,或从“异文化”到“本文化”研究的跨越以及学术“话语权”的转移等,而且是深度嵌入在场社会的人类学本身不断面临地域—国家—全球政治经济变动不居的复杂境遇的挑战,由此造成人类学本身在“山重水复”境遇中的自我省思和寻求“柳暗花明”之路的创新即学科范式的不断转型与重构。在笔者看来,用人类学的视镜自观学科史的发展,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英文简称LSE)人类学系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一直是人类学创新性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的前沿中心。如其网站自信的开篇所讲的:“久负盛名的LSE人类学系始终是创新研究与教学的最重要的中心。”^③2008年在英国的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④评审中,LSE人类学系获得了最大4*等级的最高百分比,位居英国各大学人类学系的榜首。^⑤而事实上,在首次1992年的RAE评审乃至1996年、2001年的评审中,LSE人类学系同样获得了最高的分值。^⑥追溯其百年历史,人类学在LSE奠基于1910年,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为代表,开拓了以深入、系统的田野调查为基石的现代人类学的先河,推动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革命性的范式重构,实现了这一学科由它的古典时代向现代人类学的转型。始于此,LSE人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始终保持了鹤立鸡群的领导地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包括中国的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2010—2011年笔者作为高级访问学者(a visiting senior fellow)慕名走进了LSE人类学系,同

① 本文是杨文炯承担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国际大都市的少数民族研究:以伦敦为个案》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LZUJBWZD005。

② 樊莹,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杨文炯,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高级访问学者(2010—2011)。

③ 参见<http://www.lse.ac.uk/anthropology/Home>。

④⑤⑥ 参见<http://www.rae.ac.uk>

时带着一个疑问：“什么样的秘诀让人类学研究在此长盛不衰？”也带着一个困惑：“崛起于‘蒙昧’的特罗布里恩岛的‘田野’人类学在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历练之后又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此一年的学习、研究，身临其境的学术参与和观察，使笔者通过LSE人类学系这个“田野”个案领会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学科的立身之本及其生命之源，这就是恪守人类学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研究的传统与坚持不断地学术创新的相结合，这也正是LSE人类学研究保持创造性的学术生命力和前沿地位的关键所在。并且通过这个窗口管窥了人类学在步入全球化与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态势。在笔者看来，这块他山之石同样有益于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一、恪守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研究的人类学传统

人类学诞生于近代西方崛起—殖民世界的时代，而人类学进入LSE又值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人类学在公元1904—1905年首次以民族学课程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在LSE被确立，由人类学家Alfred Cort Haddon(公元1855—1940年)执教，授课对象主要针对在大英帝国的热带地区工作的公务员和传教士。人类学教学在LSE的重要发展时期是1910年，人类学家Charles Seligman(公元1873—1940年)被任命为民族学讲师，后经过他的努力，人类学的课程在LSE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后来确立了人类学的永久教职，第一位就是他的学生马林诺斯基。但当时LSE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田野调查的经费。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30年代，人类学在LSE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马林诺斯基以其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 Islands)的“田野”民族志一举成名，1927年成为LSE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因为他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贡献，他不仅成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奠基人，而且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使LSE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摇篮和中心。他在继承Charles Seligman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教师和学生人数，同时在教学大纲里引进了新的研究领域。逐渐的发展与积累使LSE人类学系成为世界上领先的人类学研究教学的重要中心之一，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类学家，诸如Sir Raymond Firth^①(公元1901—2002年)、Phyllis Mary Kaberry^②(公元1910—1977年)等人。笔者在LSE图书馆看到了LSE重要的人类学家档案，这些档案如下：Charles Seligman(公元1873—1940年) and Brenda Seligman(公元1883—1965年)；Bronislaw Malinowski(公元1884—1942年)；Audrey Richards(公元1899—1984年)；Margaret Read(公元1889—1991年)；Sir Raymond Firth(公元1901—2002年)；Siegfried Nadel(公元1903—1956年)；Isaac Schapera(公元1905—2003年)；Phyllis Kaberry(公元1910—1977年)；Ernest Gellner(公元1925—1995年)。这些档案内容包括了他们的田野工作的文件，如笔记本和照片等，还有他们的专业论文、讲座笔记以及私人文件，包括日记和家庭文件等。另外，在人类学的档案收藏里，还包括几个重要的人类学组织如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ASA)，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COLONIAL RESEARCH)和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IAD)的档案文件。还需要提及的是LSE人类学系的Seligman图书馆，这个不大的空间几乎收藏了全部的人类学的重要经典著作，包括现下出版的有影响的人类学作品，还有人类学系的研究人员的著作以及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数字记录的作品。这些人类学的重要“史料”无疑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类学史。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成为了LSE人类学传统的表征，作为

^①Sir Raymond Firth(公元1901—2002年)，是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学生，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长期在Tikopia and Malaysia从事田野工作，是Bronislaw Malinowski在LSE的重要的学术继承人，是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②Phyllis Mary Kaberry(公元1910—1977年)，是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学生，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长期在非洲的Papua New Guinea从事田野工作，她开拓了人类学的女性研究。

物质符号也成了他们人类学研究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与精神的象征。这一点正如LSE人类学系所言的：“重视长期的田野调查已经是LSE人类学的标志，并将继续强化这一独特的优势。”^①据笔者统计，在LSE人类学系，现有教学研究人员15位，专职研究人员9位，管理人员4位，此外还有退休的教学人员7位和外来访学人员7位。这23位教学、研究人员都有各自的长期的田野调查点和彼此不同又交叉互补的研究领域。如从2001年起，Fuller、Parry 和 J Harriss承担了三项在印度从事全球化调查的项目，其中包括4名研究人员，先后从事田野工作长达9.5年；还有Stafford在中国（大陆和台湾）1年；Cannell在美国1年；Feuchtwang在中国、德国、俄国18个月；Astuti在马达加斯加6个月；Michelutti在印度6个月，委内瑞拉1年；James在南非2年；Pelkmans在格鲁吉亚6个月，吉尔吉斯斯坦14个月；Parry在印度每年2个月；Lambek在瑞士4个月；Moore在肯尼亚14个月；Scott在所罗门1年；Allen在非洲14个月；Engelke在英国3个月。另据LSE人类学研究田野点的地图显示，^②这些田野调查点密集地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在亚洲主要集中在阿拉伯的中东地区、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在非洲主要集中在中非和南非地区；在美洲主要集中在南美和北美的北部地区，同时他们的田野视点也聚焦于欧洲本土。但其田野点布局的核心轴线（在亚洲和非洲）仍然是过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历史的连续性。这些田野点基本覆盖了当今世界主要的文明区（古老的和现代的）和文化类型，让我们看到这个从大西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岛的“蒙昧”社会的“田野”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现在已涵盖了古典人类学所讲的全部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社会，形成了以“异文化”研究为主和“本文化”研究为辅的学术格局，反映了LSE人类学研究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大面积的关注和理解。因此，LSE人类学研究正是奠定在田野调查这块坚实的基石上，才登高望远，占有了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地位和有口皆碑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多样性的田野点不仅大大拓宽了LSE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为基于田野调查的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视点和理论探索的纵深。尤其在全球化的现下，以市场—经济一体化、人口流动与媒体信息快速传播为载体的全球文化的大交流并不是发生在空中楼阁里的，而是承接、运行在具体的地方性社会中的，所以这些根植于不同地方性社会中的“田野点”就成为人类学理解文化多样性和解读全球化现象的最佳视窗。如其所言：“我们把对当今变化中的世界的创新研究与保持人类学传统的核心——长期的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对人类社会性与人性本质的广泛的比较调查



LS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locations

①参见RAE的“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esteem”，引自<http://www.rae.ac.uk>。

②参见<http://www.lse.ac.uk/anthropology/Home>。

和建设性且批评性的从事社会理论相结合。”^①因此,田野调查又是人类学发展的动力杠杆,这正是LSE人类学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所在。

二、立足传统的创新:人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所有人文学社会科学中,根植于现实“田野”中的人类学是与多样性的人类社会与文化最零距离接触的学科之一,是通过品读活生生的社会与文化来理解人本身的学科。然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面对变化中的人的社会与文化世界,动感的“田野”又决定了人类学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宿命。但创新又不能抛弃传统,没有传统,创新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故步自封于传统,创新又必然是望梅止渴。对于LSE人类学的研究来说,就笔者的理解,它之所以长期领跑于国际人类学界,其根柢在于立足人类学的核心传统——田野调查的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既包含立足田野调查的反思、批判的理论实践,又体现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密切交流、对话和跨学科的相互合作、借鉴,并且这种创新不是体现在某种理论的发明,而是一种基于传统的长期坚持的学术制度、规范与内化了的学术的素养、理念和人类学的精神,并将其不断地实践在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与教学之中。LSE人类学系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未来的研究策略、计划和研究主题,包括研究生的培养。其策略主要是强调致力于学科的整体传统,积极从事海外田野工作,坚持持久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归纳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与合作。如其计划所提出的:“我们寻求进一步提炼和发展民族志的理解,既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又为了推动跨学科的交流。”^②同时聚焦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形成了目前的七大研究主题:认知/学习/文化;民族志知识;全球化/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中的法律;人格/性别/亲属关系;宗教和宇宙观;历史/时间/记忆。在笔者看来,上述策略、目标与研究主题就集中体现了LSE人类学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在他们的实践方面,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以研究为导向的系统的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

LSE人类学系历史上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类学家,乃至今天它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质量在人类学界仍然是有口皆碑的。究其缘由,笔者认为这与其以研究为导向的系统的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密切相关。

在LSE人类学系的一年,笔者聆听了Deborah James教授的“发展人类学”、Michael W. Scott博士的“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Stephan Feuchtwang教授的“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等课程,对LSE人类学系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培养等方面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

首先,在教学体系方面,立足人类学的学科特色,整体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旨在培养、提升学生的人类学的理论素养和田野工作的能力。以博士生为例,在学期间分为三个阶段:前田野调查时期,这一时期一般是12个月,主要是方法的训练、综合的研究报告的准备、针对田野调查的语言训练和准备田野调查的实际安排等;田野调查时期,这一时期一般是12—24个月,学生在完成了前期的评估如闭卷考试和具体的研究建议被审议通过,就是田野调查。具体的要求是:一是学生的田野调查必须得到系里的批准才能离开学校,二是要进行田野调查的风险评估和签署文件,三是得到学校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四是要签署旅游和健康保险以保证田野调查时期的安全,五是田野调查期间必须保持与导师和系里的定期

^①参见<http://www.lse.ac.uk/anthropology/Home>。

^②参见RAE的“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esteem”,引自<http://www.rae.ac.uk>。

联系等;后田野调查时期,这一时期一般是12—18个月,学生回到学校后,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同时被要求参加三个论坛:每周的论文写作论坛、每两周一次的准则与实践论坛(主要聚焦最新的社会理论的发展)和每周的人类学系的研究论坛。完成论文之后,要通过抄袭剽窃犯罪的评估之后方能答辩。

其二,系统的课程体系。笔者统计了LSE人类学系的2010年12月的全部课程如下:社会人类学导论,民族志与理论,阅读他者的文化,亲属关系、性与性别人类学,政治与法律人类学,经济制度与社会转型人类学,南非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人类学与人权,调查菲律宾:新的方法与民族志语境,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南亚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前沿理论,宗教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学习与认知人类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1]生产与交换,经济人类学[2]转型与全球化,比较视野下的台湾研究,南非的热门经济,此外还有针对硕士、博士的论文写作指导课程等。这些课程的设计与教学一般都有2—4位教师协作完成。这样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而且也为学生提供了在理论、方法、地方性知识、跨学科、前沿性的全面训练。例如,硕士生、博士生在第一年中被要求必须参加或完成以下课程与项目的训练:宗教人类学,亲属关系、性与性别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1]生产与交换,经济人类学[2]转型与全球化,学习与认知人类学等课程,以及参加一学期的社会人类学的统计与因果分析课程,一学期的相关其他研究方法的民族志课程,参加人类学系的田野方法论坛,参加人类学系每周的人类学理论论坛,还有导师制定的阅读材料与讨论课程。^①

其三,严谨的课堂教学。LSE人类学系在每学期(一学期10周)开学之前,任课教师就已经将准备好的课程内容(包括教学目的、要求等)以word形式的讲稿或PPT形式提交到网络上,以供学生参考、准备,在每一讲的内容里,任课教师都开列了基本阅读书目、必读书目、扩展阅读书目。教师的课堂讲授一般是1小时,同时,针对课程内容,课后还开设对应的专题讨论课(seminar),以深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不及时、认真阅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材料,就不能全面领会课堂教学内容,也无法参加课后的专题讨论课。以2010年秋季学期(Michaelmas Term)的课程“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为例,10周课程的内容如下:

第一周“现代社会与社会理论”,第二周“对象与研究方法:马林诺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第三周“杜尔干—结构功能主义—宗教与反结构”,第四周“冲突—变迁—控制:功能主义的批判”,第五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阶级、意识与变迁”,第六周“交换与礼物”,第七周“列维斯特劳斯与结构人类学”,第八周“亲属关系—社会结构—经济利益或生产模式”,第九周“韦伯的社会分工:阶级—身份与族群”,第十周“韦伯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物质与变迁的伦理解释”。

据笔者统计,这10周的课程与10周专题讨论课所开列的参考阅读材料达157篇或部,在每周的专题讨论中,又指定1—3位学生做专题发言。正是这种严谨、系统的学术训练(课堂与田野),LSE人类学系的

^①以上内容参见LSE的“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ndbook for students of MPhil/PhD in Anthropology”。

博士生项目 (PHD) 因其优秀的品质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正如其所言的:“我们致力于保持和更新学科的核心,我们培养的博士生被认可可是杰出的。”^①据统计,英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目前在岗的34%的教员皆在LSE人类学系接受过部分或全部的培训。从2001—2007年,LSE人类学系共接受全日制学生244位,非全日制学生36名,52位获得博士学位,这其中35位(约占70%)工作在各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其中有16位讲师,包括11位执教在英国的各大学,其他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希腊和墨西哥的大学,还有17位从事博士后研究),4位工作在国际人权机构,2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咨询工作等。^②

(二) LSE人类学的两大论坛:学科发展、创新的制度设置

在LSE人类学系有两大富有历史传统的讲座,一是每周五的“人类学理论研究论坛”(research seminar on anthropological theory),二是每年一次的“马林诺斯基纪念讲座”(Malinowski Memorial Lectures),前者持续了80年之久,后者已延绵了半个世纪。这两大论坛恰似LSE人类学系与国际人类学界的“库拉圈”(Kula),作为制度设置,打造了一个社区的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推动人类学发展、创新的动力机制。

1.“人类学理论研究论坛”:人类学的社区仪式

“人类学理论研究论坛”始于LSE人类学系的旗帜性人物马林诺斯基时期,由这位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主教”^③所创建,一脉相传至今。每学期伊始,“人类学理论研究论坛”的日志表就已经一如既往地挂在了网页上,地点总是在以LSE人类学的奠基人Charles Seligman的名字命名的Seligman图书馆,并且在每周星期五的早晨10:30—12:30如期举行,全系的教学研究人员,还有研究生,包括慕名而来的听众陆续走进这个不大的空间,它的左侧是一排装满人类学经典的高达屋顶的书架,其对面的墙上在窗子相间的地方挂着具有土著风格—图腾内容的布画,而横侧的另一面墙上挂着LSE人类学的“圣徒”Charles Seligman、Bronislaw Malinowski、Sir Raymond Firth等杰出人类学家的装有镜框的照片,它的对面就是用于讲座的投影仪的幕布。此处此时,作为一个从事人类学研究者置身其中,不论空间、时间、内容,还是历史记忆与主题再现都构成了一个圣的空间,它恰似人类学的“教堂”,这个定期的论坛就是这个人类学社区的仪式——每周的“聚礼”,一如宗教的礼拜日。一年3个学期、30个星期这个传统仪式就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和一群恪守着人类学的传统与信念的人中间周而复始地展演着。如2010年秋季学期的“人类学理论研究论坛”的主题如下:

10月8日,主讲人Chris Pinney (UCL),主题:巫术与技术作为历史的变量——人类学与摄影从泰勒到列维斯特劳斯。10月15日,主讲人Jon Bialecki (UCSD),主题:基督教的自由与基督教的固定性——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福音终极目的与反终极目的。10月22日,主讲人Deborah James (LSE),主题:钱的轮回——南非地区的财产个人经济、愿望与债务。10月29日,主讲人Victoria Boydell (LSE),主题:创造持久的爱——中心伦敦的计划生育诊所的避孕方法的研究。11月5日,主讲人Fenella Cannell (LSE),主题:亲属关系的复魅——当代美洲的“血缘”、

^①<http://www.lse.ac.uk/anthropology/Home>。

^②参见RAE的“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esteem”,引自<http://www.rae.ac.uk>。

^③Robert Gordon, Andrew P. Lyons and Harriet D. Lyons,“Fifty Key Anthropologists”. P141.First published 2011 by Routledge.